

刘树勇:

# 读“无用”的书 画有趣的画

徐嘉伟 杨雨千



老树作品

刘树勇

## 弘扬东方文化 促进交流互鉴

纪念《东方文化集成》出版三十周年

曹语千

近日,《东方文化集成》出版30周年暨季羨林先生诞辰112周年纪念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本次活动由《东方文化集成》编委会、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联合线装书局主办。

在季羨林倡导主持下,《东方文化集成》丛书于1993年开始编纂。从1997年开始,《东方文化集成》先后出版了季羨林、池田大作、汤用彤、张岱年、林庚、叶渭渠以及汤一介、乐黛云和严绍璵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的学术成果,截至目前已出版200本,成为国内东方学研究领域层次最高、阵容最大、最具权威性的大型丛书之一,曾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重大出版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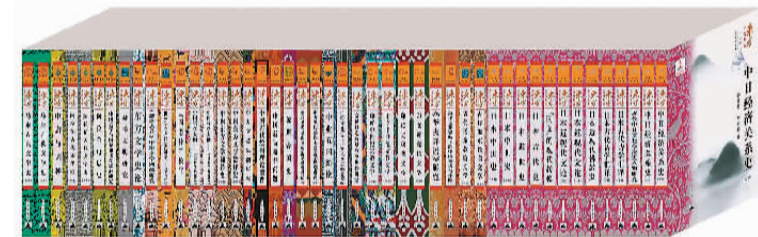
30年前,季羨林提出“21世纪东方文化将再领风骚”的论断;30年后,历史印证了季羨林的远见卓识。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东方文化集成》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东方文化,致力于在东方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与西方文化对话所需要的东方话语体系,形成东方文化研究领域的中国学派。

《东方文化集成》覆盖地域甚广,囊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等属于东方文化体系的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研究著作;学科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宗教、语言、文学、艺术等,关注民族与文化交流等领域,力图全面展现古今中外东方各国的优秀文化。与会专家认为,《东方文化集成》发掘和整理了东方文化遗产,弘扬了东方优秀文化,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文化交流。

据了解,已出版的《东方文化集成》丛书专著中,有近1/3获得国家、省部级科研奖项,有的还获得国际文化交流贡献奖,被许多国家的图书馆收藏,受到海内外广泛好评。《东方文化集成》的出版,践行了季羨林不仅“拿来”、更要“送去”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搭建起东方学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是一项具有基础性、开拓性、前瞻性和时代意义的文化工程。

纪念会上,专家学者纷纷表达了对季羨林等老一辈“集成人”的深切缅怀,认为“文化自觉,不畏岁月,淡泊名利,甘心奉献,脚踏实地,严谨治学”是他们自觉的价值追求,这份精神支撑着陈嘉厚、张殿英、叶奕良、麻子英等老一辈编委呕心沥血投入《东方文化集成》出版事业。年轻一代学者也接过前辈接力棒,传承老一辈学者精神,戮力赓续中华文脉。

展望未来,与会专家表示,《东方文化集成》工程依旧是“未完待续的进行时”,东方学依然存在诸多待发掘的课题。有关东方学与文明互鉴、“一带一路”和区域国别研究等方面的高水平论著有望纳入出版规划,进一步服务国家文化发展战略。



《东方文化集成》部分书影。

《东方文化集成》编委会供图

### 加强海内外中文古籍交流合作

### 首届“世界高校中文古籍论坛”举办

本报电(叶连荷、曹媛媛)近日,首届“世界高校中文古籍论坛”在京举办,本次论坛由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办,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承办。论坛邀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韩国庆星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院校从事中文古籍收藏整理与研究以及古籍数字化领域的学者,旨在进一步推动海外汉籍整理与研究,加强海内外中文古籍领域从业者交流,挖掘中文古籍时代价值,探讨新时代中文古籍数字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共享。

为期两天的论坛围绕“古籍整理与保护”“古籍数字化”等主题展开,并召开了青年学者论坛。参会学者从古籍整理的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等角度,展示了各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围绕古籍可视化、数字化最新成果,提出结合现代计算机技术对古籍进行整理

理与研究是必然趋势,具有良好发展前景。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吴振武阐述了未来古籍整理的思考,认为古籍整理工作在不断完善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缺乏统一规范的繁体用字标准等问题。他提出,未来或可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古籍整理,协同处理繁简校正、语词注释、主题提取、资料类聚等工作。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河野贵美子从明代宝成的《释氏源流》切入,介绍了对《释氏源流》的一系列考证研究,并提出建设中文古籍跨国目录的构想。她表示,“期待由中国高校与政府等权威机构主导,开设可随时更新、查阅的线上古籍平台。”

与会者表示,希望在北京大学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的基础上,定期由世界高校轮流主办中文古籍论坛,进而形成学术联盟,扩大中文古籍的世界影响,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 出版界共话中国式现代化

本报电(曹语千)近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在北京举办“2023望道出版论坛”,本次论坛以“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就“如何让中华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等议题展开研讨。

专家们一致认为,出版业要把握中华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深刻思想内涵,将其与出版业的产业特点相结合,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出版的精神气质,并在出版实践中贯彻始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

古籍出版板块成绩突出,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论坛期间举办了精品书展,展出了《蔚南》《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枢纽》等数十种人文社科图书,并举办了出版合作签约仪式,数名专家学者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据悉,“望道出版论坛”已举办三届,在促进学术研究、加强学术交流、推动学术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

听艺术看似抽象、模棱两可,其实自有门道。例如他提到沃林格的《抽象与移情》,有助于学者理解抽象艺术,在其中找到清晰的脉络。老树还提到阿恩海姆的《视觉思维》,“不仅文字是思维的工具,纯视觉也有思维。”因此不能凭直觉去理解,而要用理性介入。

他曾被一个问题深深困扰。“从小到大都听到一句话,艺术是相通的,可如果艺术真的相通,为什么还分这么多门类?”为此,24岁的刘树勇用一年时间收集大量资料,严谨证明假设,最后写出一篇1.8万字的文章《艺术的自律性》,来论证不同类型艺术间的不可替代性。

除了理论研究,老树还从兴趣出发进行艺术实践。他回忆道,自己的首次陶艺创作以失败告终。“吭哧吭哧画了7天釉彩花纹,烧制24小时,最后得到一堆起泡的碎瓷片。”老树发现,从前掌握的绘画规律无法用在陶艺上。对视觉语言的研究和实践,让他意识到直觉和理性结合的重要性:“直觉只能停留在想法层面,理性的系统训练才能将想法付诸实际。”

阅读形成的人文积淀与做研究形成的理性思考相得益彰,让老树得以充分表达想法,将其转化为一张张富有文化底蕴的漫画作品。但对老树来说,在绘画中不断找到真实的自我,才是促使他持续创作的灵感源泉。

### 用漫画与读者共情

“大学期间一个偶然机会,在画展上看到齐白石和徐悲鸿的真迹后,我就对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老树说,那时他把钱几乎都用在画画上,买画册、访名家,一度还想从他就读的南开大学中文系转学到天津美术学院。

但就是这样一份近乎“痴迷”的喜爱,却在几年后戛然而止。“那时候我画齐白石的虾,画徐悲鸿的马,都画得不错呢。但那只是用我的努力证明有齐白石、徐悲鸿存在,根本没有‘我’在。”因为找不到“自己”,他从1986年开始放下画笔,一放就是20年。

再拿起画笔,已是2007年。“那时父亲生病,手术前的那晚,心中塞

### 名人书房

长满荷叶的荷塘边,两位头戴礼帽的男士迎面而坐,配上独具特色的六言题画诗“春风起处看花,荷塘岸边吃茶。世间从来不易,且度有限生涯。”——一幅氤氲着浓浓乡野情趣的水墨漫画令人眼前一亮。从2011年起,“@老树画画”开始在微博平台发布漫画,收获超255万粉丝关注。粉丝们不仅在线上赏画,还在评论区用“打油诗”留下各自赏画的心得随笔,形成独特的互动空间。

“@老树画画”本名刘树勇,198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艺术系主任、教授,合著有《中国书法导论》《图文二十世纪中国史》《中国当代摄影批评文丛》等,相关画作曾登上央视春晚舞台。近日,我们来到刘树勇位于中央财经大学的工作



老树作品

室,听他讲述研究视觉语言的心得,听他分享用漫画表达人生感悟的创作故事。

### 注重文史哲积累

在老树记忆里,大学时,全社会的读书氛围浓厚,人人渴望知识,朋友们的聊天话题离不开诗集与小说。“上世纪80年代,我们没有电脑、手机,中国还未全面接入互联网,获取知识只能靠阅读。”

老树说,当时的印刷厂还不具备数字印刷条件,大都用铅字版印刷。“一本书如果几千页就得有几块板子,可以堆一整屋。”他生动地比划道。那时的书都采用凸版纸,纸张很脆,一折角就容易掉,但因为从业者严谨认真的工匠精神,用这一老式印刷法制作的书籍错误很少,因此老树将许多繁体竖版的旧书珍藏至今,“根本舍不得扔掉,太宝贵了。”

老树尤其爱好哲学,他形容:“哲学如同空气一般存在。”他特别喜欢的哲学书是《理想的冲突》,因为这本书帮他理清了很多问题,让他系统地认识到人性的构成,找到了理解自己内心的切入点。“我得以明白‘我是谁,为谁而活’。”老树说。青年时期的大量阅读帮老树搭建起认知世界的框架,他在头脑中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这对他日后的研究与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阅读,老树认为不必在意读过多少本,重要的是和书建立关联,让知识真正进入自己的头脑,渗入思维,成为修养,这样书里的内容才会真正改变我们。此外他还格外强调文史哲阅读积累的重要性。“文史哲类书籍被不少人称作无用之学,但实际上文学开拓想象力,历史提供经验坐标,哲学提供世界观方法论。有了想象力、经验和方法论,做什么都会有帮助。”老树说,这就是无用之学的大用途。

### 阅读培养思辨力

阅读积累的人文素养不仅让老树形成深度的思辨力,也为他的专业研究带来强大支撑。老树告诉我们,视

## 燕土维宅 风物熙熙

——读《大都:元代北京城》

杭侃

今年5月,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一则微信推送《元大都文物最集中的特展即将开幕》引起广泛关注,推送介绍的“大都:元代北京城”展是该馆“运河城市”系列展览的延续,分为大汗之城、河间大都、大都风华3部分共6个单元。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同步推出的图录《大都:元代北京城》是展览的延伸,收录近300件文物精品和5名学者的专文,为不能到场的观众提供了解元代北京城的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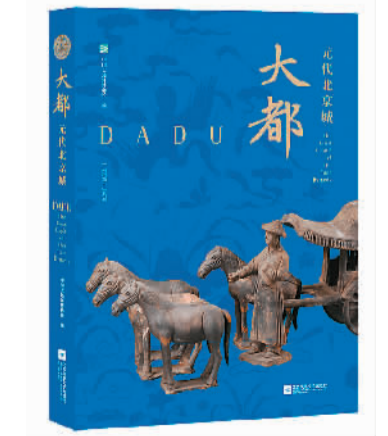
元大都(“汗八里”)被马可·波罗描绘为世界上最宏伟的都城,他写道:“全城地面规模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大都:元代北京城》除在第一部分“大汗之城”的“壮哉帝居”单元讲述了元大都的规划特点,还特辟第二单元“巧匠能工”,展

示了元大都建设者刘秉忠、张弘略、任仁发、范文虎、杨琼等人的相关文物。启功在《从河南碑刻谈古代石刻书法艺术》中指出:“古代碑志,在元代以前都是在石上‘书丹’,大约到元代才出现和刻帖方法一样的写在纸上,摹在石上,再刊刻的办法。”这两个单元收录的大型石刻,和以往蒙元时期展览多展书画和法帖不同。

元大都与运河相辅相成的关系,是该书第二部分“河间大都”着重表现的内容。这一部分分为“清波千里”“挽河而输”两个单元。充满活力的运河,不仅给元大都带来了便利的交通和山水辉映的景观,更使全国的物资汇聚于元大都。《元史·食货志》记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

江南。”水运和海运的成本少于陆运,因此,元朝统治者注重运河和海运的治理与建设,与水运相关的运河、码头与沉船遗迹屡有发现。展览图录中的沉船出土文物丰富多彩,包括元大都出土的来自南方的大量陶器。书中收录的专文《元大都出土景德镇窑青白釉瓷器及相关问题研究》集中讨论了北京历年考古发掘出土的景德镇窑青白釉瓷器,种类包括供器、酒器、花器、茶具、文具等多种,涵盖都城生活的方方面面。

元代文化的多元性在都城中也体现得最为明显。展览图录第三部分“大都风华”的第二单元“区宇升平”收录了梵文银盘、中央饰有十四臂准提菩萨像的铜镜、也里可温十字寺石刻、《敕赐十寺碑记》等。蒙古族在接触



汉文明之前,就已广泛接触西方文明,因此,他们对各种宗教采取的是兼容并蓄的政策,相关工艺品也是博采众长。日常生活里,精致的器物蕴藏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大都:元代北京城》生动讲述了古都北京与运河相互交融、影响的故事,让读者可以从中领略元代文化的生机勃勃。  
(作者系云冈研究院院长)